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专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保军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王聿昊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保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举措,对于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激发经济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说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杨保军表示,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两个转向”的重要判断,明确了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城镇化发展规律看,我国已呈现人、地、房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当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后,城市发展重心必然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质,城市更新成为普遍选择。

“我国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城市发展进入成熟期后,为适应新环境、新需求而进行的一次整体进化和结构性新陈代谢,是城市发展逻辑与动能的根本性转变。”杨保军表示。

他解释说,作为生命体、有机体,城市一般会经历初创、成长、成熟、衰退、复兴的演变过程。进入成熟期后,城市往往面临增量红利衰

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发展需求升级等压力,也存在建筑和设施老化、安全隐患增多等客观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市就可能进入长期衰退,出现产业空心化、人口流失、税收萎缩等现象。城市更新正是避免衰退、走向复兴的关键路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更新有何不同?杨保军说,我国仅用几十年时间便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衰退后被动补救相比,我国强调政府积极干预、正确引导,在成熟期就未雨绸缪、适当提前启动城市更新。

杨保军说,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生态环境、文化传承和城市治理等方面。只有把这些目标统筹起来,城市更新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城市整体转型的力量。

因此,与发达国家循序渐进的更新范式不同,我国城市更新具有并联式、系统性的特征,亟须推动城市更新工作从串联分步实施转向并行统筹推进,在多元模式并存下构建系统协同的城市更新框架。

实现高质量城市更新,具体有哪些路径方向?杨保军说,为扎实

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可着重从“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公共空间品质提升、遗产保护与活化等方面发力。

具体来说,就是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着力满足居民多样化高品质生活需要;以老旧小区改造为突破口,逐步形成多方协同协作机制;以存量资产盘活利用为重点,推进投建运一体化;以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为载体,统筹环境改善、百姓需求、经济发展多元目标;以遗产保护与活化为主线,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城市活力与魅力。

杨保军表示,我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城市更新政策性金融支持、规划与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统计等一系列配套机制加快落地。另一方面,城市更新投资规模由2023年的2.6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3.2万亿元,对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

下一步,城市更新如何向纵深推进?杨保军表示,要大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堵点难点,建立全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越往深处走,城市更新的复杂性就越明显,面对的就越不是单一的建设问题,而是资金、产权、规划、

运营等多方面问题。”杨保军说。

他表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征地—规划—出让—建设—销售”的增量开发制度体系。进入城市更新时期,产权复杂化、不确定性增强、投资周期长成为常态,涉及资产权益的平衡与再分配,现有制度调整相对滞后。

坚持法治化、制度化是规范和促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保障。杨保军说,要加快城市规划、空间管控、不动产登记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切实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赋予城市更新规划更大法定权限,引导城市更新项目精准落地实施。

同时,要打通部门行政壁垒,增进协同联动,鼓励地方探索创新更多新模式新路径。要降低土地、税费、融资等方面制度性成本,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项目运营收益能力,提升城市更新综合效益。

杨保军表示,城市更新需协调平衡好各方利益诉求,推动不同主体深度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不仅要激活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还要打通投资堵点,有效消除各类主体投资城市更新的顾虑,理顺政府、居民、市场三方权责,形成“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房出房、有政策出政策”的多方合作模式。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当AI遇见岐黄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田晓航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展台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一米多高、有人形轮廓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正为假人模特捏肩推拿,动作有模有样。

“这款机器人以灵巧手及具身手臂为基础,能够模仿推拿基础手法。”展台工作人员张陆政介绍,机器人还集成推拿专家模型,可以实现智能诊断。

智慧中药房AI调剂质控系统、名中医AI智能眼镜、自助中医四诊仪……一系列创新产品,正是人工智能与中医药教学科研深度融合的一个切片。

“人工智能深刻重塑教育生态,要顺应数智变革之势,呼应育人改革之需,主动将人工智能与中医药传承创新深度融合,探索守正创新的育人新范式。”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瑶琪说。

输入一条方剂配伍的疑问,手机屏幕上很快便出现方药逻辑与专业解析。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研发的“薪火中国药”中医药教育大模型,如同一位“电子助教”,随时随地解答学生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刘铁钢介绍,这个大模型整合海量中医药典籍、中药理论、教育课程、本草知识、方药体系等多维度中医药数据资源,已经入选教育部首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专用大模型建设项目。

传统教学场景正在改变,多所中医药高等学校正着力培养精通岐黄医术、兼具数智素养的中医药创新人才: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药人工智能学院、推动黄帝内经和推拿学虚拟教研室建设,推动教学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单向传授向人机协同转变;广州中医药大学2026年新增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以“人工智能+大健康”交叉融合为核心特色,构建“数理基础+AI核心+医学特色+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打造了智慧中医诊断学、中药药性识别与智能配伍、虚实融合的经络诊疗等一系列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课堂……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李梓媛看来,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整理中医古籍,挖掘名老中医经验,也能辅助辨证、方药推荐,以“数字师承”的方式帮助青年医生缩短学习曲线。

“人工智能可以把很多只可意会的老中医经验转化成可以学习传承的知识,但替代不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思维,最终的诊断和治疗决策,还是要回到中医经典的理法方药体系中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班学生赵乐怡和同学们的讨论,也代表着新生代中医人对技术边界与守正创新的深度思考。

今年正值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走过70年。师生们感到,人工智能正在为中医提供一副全新的“认知透镜”。

“我们需要更清晰地、更系统地审视那些千百年来依靠直觉和经验把握的生命现象,从而让古老智慧焕发新的科学光芒。”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季光说。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京昆合璧度中秋 两岸戏曲团体台北共演经典

新华社记者 马欣然 黄扬

26日,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의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记·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

此次演出由台湾酷云剧场特别策划,定于26日、27日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的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感慨道:“戏迷们的大力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

当日舞台上,青春气息与经典韵味交相辉映。昆山当代昆剧院的青年演员率先亮相,带来《杨家将·挡马》《红梨记·亭会》等经典折子戏。他们文武兼备,各展所长,展现了昆曲新生代的扎实功底。随后,李宝春与大陆昆曲名家李鸿良联袂登台,共同演绎《琵琶记·扫松》。高亢唱腔与敏捷身段完美融合,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京昆虽同源,但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正需相互借鉴。”李宝春说,台北新剧团多年来持续探索京昆合作的新路径,此次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携手,不仅有舞台上的观摩,更让两岸演员走进同一间排练室,近距离切磋技艺。

在李宝春看来,青年演员是戏曲传承的未来和希望。他提到,台湾年轻戏曲演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坚持学戏、演戏,殊为不易。与大陆院团的合作,他们得以接触更多元的艺术风格,丰富表演经验,这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此次已是李鸿良第42次赴台演出。回首多年来的交流历程,台湾观众对昆曲的热爱与尊重始终令他动容。“这次我带了剧院青年演员入岛演出,希望他们在展示所学的同时,能向前辈名家请教,在两岸艺术交流平台中开阔视野。”

秉持“言传不如身教”的理念,李鸿良认为,传统艺术的传承离不开长期的坚守,更需要在舞台实践中相互砥砺。他期待两岸院团能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为青年演员创造更多共同排练、同台演出的机会。

对于32岁的台北新剧团青年演员孔玥慈而言,此次演出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契机。“除了台上的演绎,我也在台下认真观摩大陆青年演员的表演,从不同的剧目和行当中汲取养分。”孔玥慈告诉记者,今年10月,她将随团赴山东滨州演出,随后前往烟台、河北保定及北京巡演。

“只要年轻人有兴趣,传统戏曲就有前途。”李宝春期待,未来两岸戏曲团体能开展更多深层次、近距离的合作,让青年演员在共同排练与同台演出中互学互鉴,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新华社台北9月26日电)

健身瑜伽·普拉提公益活动上海举行 全民健身推动产业扩容

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健身瑜伽·普拉提公益活动日前在上海落幕。本次活动将专业教学资源与科学健身理念送到市民身边,吸引了上千名瑜伽与普拉提爱好者参与。

活动现场,资深讲师与医疗专家联袂授课,从体医融合视角解读普拉提在脊柱健康与运动康复中的应用,并设置了“基础、提升、进阶”三段式跟练环节,让零基础市民也能在专业指导下安全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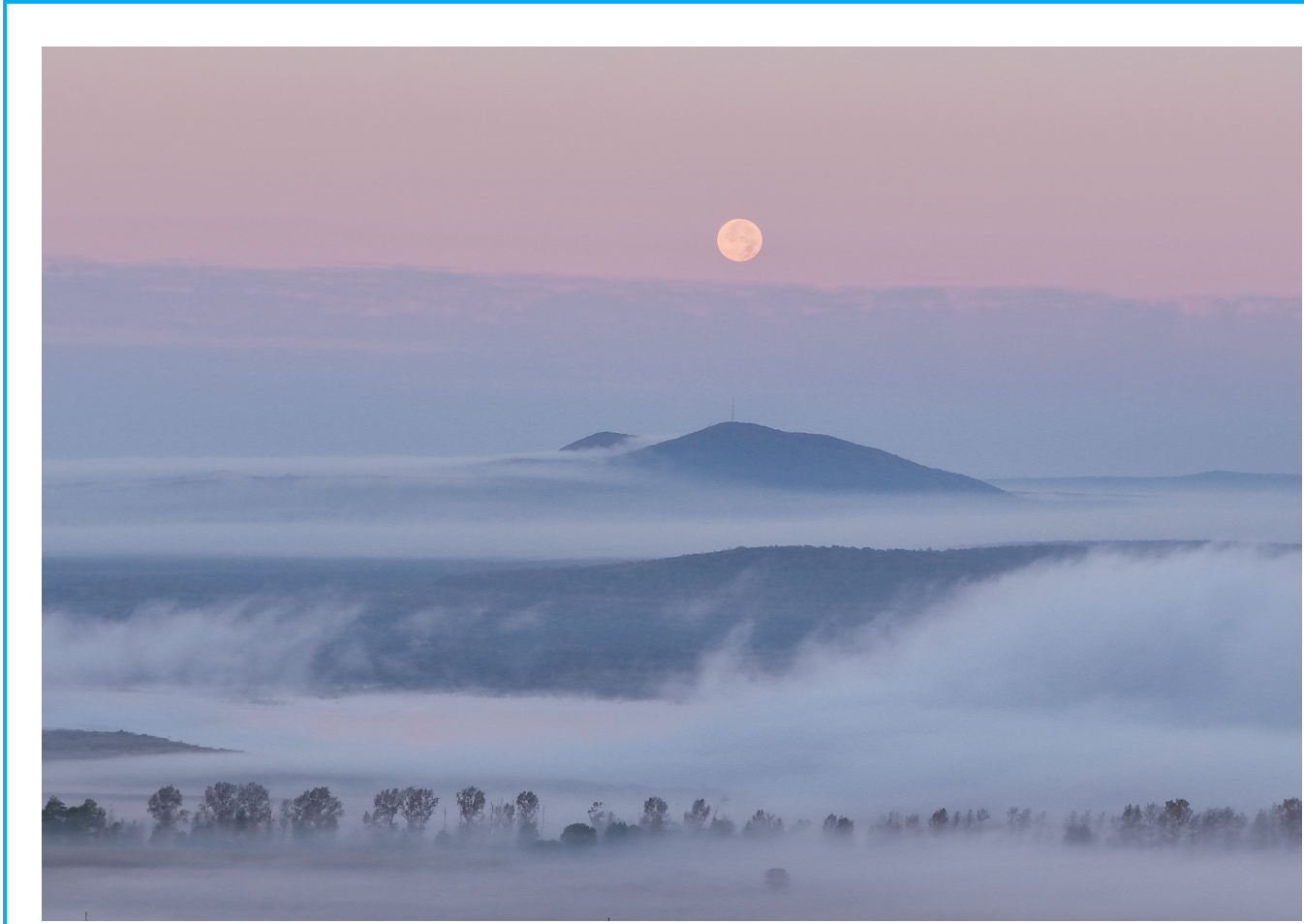
业内人士认为,瑜伽和普拉提正从都市白领的小众爱好,成长为全民健身版图中学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上海体育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发布的《2025健身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瑜伽/普拉提馆门店数量

已达到35683家,半年内增幅达到4.4%。

在县域市场,普拉提馆也在加速下沉,成为小城女性健身社交的新选择。瑜伽与普拉提因其对体态管理、产后修复和慢性疼痛的改善效果,精准回应了现代女性的核心诉求。与此同时,参与群体正在拓宽——男性学员逐渐增多,银发族和青少年体态矫正人群成为新的增长点。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牵头推进普拉提项目培训考核标准制定,行业正从“跑马圈地”转向专业化深耕。随着科学健身的理念借助公益形式下沉到社区和商圈,瑜伽与普拉提正成为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上海9月26日电)



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今年农历八月上演“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0时49分。

图为9月27日凌晨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风景区拍摄的月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冲破封锁报道长征全貌

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陈潇雨 刘颖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89年前,上海滩知名文史半月刊《逸经》登载一篇署名“幽谷”的万字长文,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炸响”。

这篇文章,就是《逸经》“今代史料”栏目在1937年7月5日刊登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在国民党统治区期刊公开介绍红军长征完整历程的文章。它的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还早半年多。”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樊琳说。

在上海图书馆,记者见到了这本杂志实物。历经近九十载光阴,杂志封面图案已经模糊,但“逸经”二字依然醒目。泛黄内页中,“毛泽东像”“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三幅图片,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

文章系统讲述了红军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决策战略转移,直到红一方面军抵达吴起镇、随后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全过程。

在作者“幽谷”笔下,突破湘江封锁、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

定桥等长征途中重大节点跃然纸上。在讲述强渡乌江时,文章写道:“乌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一米八,寒度在十度以下……当时有十八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二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黔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形势之危急、飞渡之艰难,在字里行间真切可感。

人们不禁要问,“幽谷”是谁?他何以在当时清楚知晓长征历程中种种艰险经历,文章又是如何成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发表?

“‘幽谷’究竟是谁,曾长期让史学界界疑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最终确认:‘幽谷’是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樊琳说。

董健吾,1891年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在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教堂牧师。1936年,他受宋庆龄之托到西安,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客观上促成了后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和中译本《西行漫记》的诞生。

樊琳说,这层特殊的身份,也使得董健吾得以接触到由红一方面军将士撰写、红一方面军组织编辑的

反映长征历程的资料汇编原稿,这些材料为西引记的成稿打下基础。

西引记发表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还未开始,中共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被叫作“赤匪”或“流寇”。而《逸经》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标题直接使用“红军”,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学者分析,杂志主要靠人脉、刊物定位和文字策略为发表争取空间。《逸经》时任社长简又文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交往密切。而其杂志社和印刷所又地处上海公共租界,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力度稍弱,且此前已发表过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可看作为西引记“试水”。

此外,文章从标题就巧妙“伪装”,采用语义更中性的“西引”,而非“西征”,还故意在正文内使用了“围剿”“西窜”等字眼;《逸经》一直以“无党见”为定位,文章的前言特意声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考其异同,辨其虚实”。

然而,西引记内文虽未直接称赞红军作为,但一次次绝处逢生、周旋奋战的革命豪情浸透在字里行间——对于懋功会师,文章以“炮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异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千万个铁锤”描写;强渡乌江处,以“黔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无人之地”作结……

20世纪90年代,董健吾之子董云飞撰文回忆,父亲在1948年养病期间与子女谈及曾在《逸经》杂志上发表西引记,对自己的作品“甚为得意”,“恋文之情,溢于言表”。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又多次与子女提及此事,嘱咐他们寻找当年的《逸经》刊物,“向党献出书稿”。

直至1986年,董云飞的妹妹董静云于徐家汇藏书楼查到此刊物。数年后,董云飞专门发表文章,向公众讲述这篇西引记背后的故事。

西引记发表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의正面形象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发舆论反响。

至此,舆论战场上的“红色长征”已无法阻挡。专家认为,共产党的舆论斗争策略既显胆识,更见格局——不局限于自辩与叫阵,而是书写红军穿越万里险途的真实历程,用一路的军民相亲和严明纪律,直观呈现人民军队的本色。

1937年7月中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型期刊《月报》转载此文,并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此后,以此文为基础的各种介绍长征的文章、图书出版,使广大读者对中共和红军有了崭新了解。

“人们由此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是一支有纲领、有信仰、有纪律的人民军队,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樊琳说。

(新华社上海9月27日电)